

中国社会科学家 联盟史

徐素华 编著

中国卓越出版公司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史

徐素华 编著

中国卓越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 邱 禾
封面设计 尚征武

GD270/62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史

徐素华 编著

中国卓越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空军指挥学院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7.3印张 200千字
ISBN:7-80071-251-6/K·5

定价: 3.20元

序

李一氓

五四运动以前，马克思主义学说已被介绍到中国，但不为知识界所注意。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这样一次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大解放运动，马克思主义学说因而得以广泛的传播，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样，中国革命形势在国共合作的名义下急剧发展，爆发了1926、1927年的大革命。但这个革命被南方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勾结和与北洋军阀妥协而告失败。

1928年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极端反动的时期。共产党员遭到大批屠杀，党的力量由五万人削减为一万人，损失很大。这时，在南方农村中虽然开始了党领导的农民游击战争，但和国民党军队相比较，还是处于绝对的劣势。

在城市中，党的宣传阵地更为孤立，遭到由右到“左”的来自各方面的攻击。如：国民党改组派的汪精卫、陈公博等有《革命评论》，周佛海、陶希圣等有《新生命》，胡适之等有《现代评论》，最反动的国家主义派曾琦等有《醒狮》、《孤军》，托洛斯基派有《动力》。中国共产党成为这些不同派别的共同攻击目标。

中国共产党则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下状态，但对于这些攻击必须加以反击。正如列宁所说：“一个要存在的党，在必要存

在的方面，不能和要把它埋葬的敌人进行妥协”。这就成为与农村游击战争相并行的一条理论战线。担任这场战斗的同志，他们一部分是受过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留苏学生，一部分是有马列主义倾向的留日学生，一部分是大革命失败后仍然留在党内的有一定理论基础的知识分子党员。1928、1929两年之间，以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为武器，坚决顶住了反马克思主义的各派系的攻击。他们维护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维护了马列主义的尊严。经过两年的实践，这不仅取得理论战线上的胜利，并且获得了国内广大学生群众的支持。他们逐渐感觉到和左翼作家同盟一样，应该有一个自己的群众组织来更普遍的传播马克思主义。

从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经过五四运动，经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大革命，经过近两年的艰苦斗争，对于有觉悟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来说，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是很陌生的学说了。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的空想与实际，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关于土地问题的实质，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关于简单的共产主义ABC，都已经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群众基础，所以成立这样一个组织，扩大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很有必要了。于是1930年5月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

这个联盟明显的是一个行动的团体，而不是一个学术组织。假如它是一个学术组织的话，就应该命名为中国社会科学家协会了。如象它的纲领第一条所说的那样，“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及国际的政治经济，促进中国革命”。最后一条更说“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是限于理论的研究，无疑地应该努力参加中国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际斗争”。第一条的

落脚在于“促进中国革命”，第五条就直接宣称，“应该努力参加中国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际斗争”。这是个非常直率的行动方针而不是简单的学术指标。搞任何学术研究都需要有一个适当的客观环境，然而他们并没有这样一个客观环境，当时的客观环境要求这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既站在理论战线的前列，更主要的是要加入实际斗争的队伍，去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他们这样做了。

在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上，他们翻译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包括恩格斯的著作、列宁的著作；准确宣传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并在劳动问题上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反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坚持土地革命，维护贫苦农民的利益，反对地主富农路线。

更重要的是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普遍到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为此，在上海的各大学当中，如复旦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南洋大学，都在学生中不同形式的建立了读书会、讨论会、研究会，使得他们初步的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这些组织有时是自发的，但大多数都跟“社联”有直接关系，并得到“社联”的直接帮助。

同时由于北平地方党的活动，在北平建立了“社联”的分盟。它归北平地方党领导，和上海的“社联”没有什么严格组织关系。但这个北平分盟的工作方针、工作方法跟上海“社联”的工作方针、工作方法是一致的。学生这个社会，北平有北平的情况，上海有上海的情况。就“社联”在学生当中的活动来说，北平的分盟更为活跃一些，更为普遍一些，更有成效一些。

这种组织不仅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即或这种传播是很初步的、很浅率的，但却更进一步的影响了他们，促成了他

们世界观的改造，更接近无产阶级，更接近共产党。因而在“社联”当中大多数学生都加入了共产党。有意义的是他们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都成为抗日战线各个领域的骨干力量。在北平分盟的成员当中这种情况尤为明显。“社联”的活动大概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其实际斗争的对象遂逐渐向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的南京政府。西安双十二事变使得全国的抗日民族斗争走向一个高潮，民族斗争代替了阶级斗争。在这种情况下“社联”的历史任务就自然地完成了。

回想起来，他们从1928年到1937年，十年的理论战线斗争基本上是正确的。有人批评这批青年，即这批“社联”的南北成员，议论过“左”，不讲策略，全面出击，不会争取中间派，如此等等。我以为这不完全对。因为自192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大为削弱，地位非常孤立，而地主资产阶级左、中、右各派，都从各方面攻击共产党。国民党更以残酷地镇压办法企图完全消灭共产党。这批青年知识分子为了党的存在不得不进行自卫反击，斗争只有一个单方面是不能进行的。“共匪”之名、“剿匪”之说，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共产党人能够对此忍气吞声吗？后来这种斗争的停止是跟全国的具体政治斗争相适应。共产党高举民族抗战的旗帜，公开宣布放弃阶级斗争，停止土地革命，这样使我们和中国各种政治社会力量的关系取得一个极大的调整，有了一个更大的相互关系的回旋余地，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我们所坚决反对的是中国政治社会投降、妥协的极右分子。

这个时期，各种政治社会集团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也有不同程度的改变，有各种不同思想倾向的爱国青年冒险地奔向延安，有些民主党派愿和中国共产党友好合作。历史证明，

由于出现了一个中国民族命运的极大的转折点，中国各阶级、各社会阶层、各集团都不得不走向抗日统一战线。但就是在那个时候，国民党的外部文件仍称共产党为“异党”，内部文件继续诬称共产党为“共匪”。

“社联”的历史任务完成之后，回顾它的存在和它的经历，我觉得它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即或是很初步的、很浅率的，但对于中国社会的前进还是作出了历史的贡献。潦草地以“极左”两个字把它一笔勾消，是不正确的。

我们仍然坚持不仅要以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更要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坚持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反对一切教条主义。

一九八九年冬至日于北京东城书屋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成立	1
一、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兴起	1
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成立	21
第二章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组织领导及其活动阶段	29
一、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组织领导层次	29
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党团组织	32
三、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活动的几个阶段和特点	38
第三章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与社会科学研究会、 左翼作家联盟等文化团体的关系	57
一、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成立及其领导系统	57
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基层组织分布	59
三、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活动及其特点	61
四、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与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合并	63
五、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与 各革命文化团体团结战斗	64
六、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与 左翼作家联盟等开展工作竞赛	68
第四章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文化理论宣传	74

一、新兴社会科学著作的出版	74
二、开展书报评论引导青年学习新兴社会科学	83
三、创办刊物介绍新兴社会科学	89
四、讲课办学培养革命新人	103
五、提倡社会科学“面向大众”	109
第五章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参加的理论问题论战	117
一、参加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	117
二、参加哲学战线上的论争	136
第六章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参加的社会政治斗争	162
一、声援苏维埃政权	162
二、反对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	169
三、参与组织国际反战大会	171
四、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75
第七章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分盟	181
一、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北平分盟	181
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广州分盟	206
三、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东京分盟	221

第一章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成立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村进行武装斗争，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同时，以上海为中心，积极开展革命文化运动。一批批党的理论工作者和进步知识分子，从各地汇集到了上海，开展马克思主义新兴社会科学的介绍和研究工作，成为文化理论战线上的一支强大力量。为了加强对这条战线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一个社会科学方面的统一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由此又推动了新兴社会科学的研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一、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兴起

（一）兴起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原因

二十年代末，一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为中心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在中国兴起，这不是一种偶然现象，也不是少数人鼓吹的结果，而是有着特定的国际环境和深刻的国内原因。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世界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期。资

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空前激化，表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剥削更加厉害，资本主义国家对国外殖民地的压榨更加残酷，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你争我夺也日益加剧，从而不可避免地引起世界大战。世界大战的爆发，动摇和震撼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促进了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发生和发展。于是首先有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自此以后，世界上其它国家也先后相继爆发了革命。1918年，有芬兰发生的工人革命、日本发生的“抢米暴动”、澳大利亚和德国发生的推翻君主统治的革命。1919年，匈牙利发生了苏维埃革命，朝鲜发生了暴动，在德国巴伐利亚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20年，土耳其发生了资产阶级民族革命，意大利的工人运动发展到了夺取工厂的地步。1921年，德国发生了工人暴动。1923年，保加利亚发生了暴动，德国爆发了革命斗争。1923年德国革命的失败，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尖锐矛盾所引起的直接革命时期的结束。这一时期直接革命行动的成果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苏联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胜利和巩固，另一方面则是许多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失败。其原因主要有社会民主党的叛变，领导革命斗争的无产阶级政党，许多工人被改良主义所蛊惑，等等。

由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失败，资本主义在加重剥削本国工人阶级及殖民地劳苦群众的基础上，进入了暂时的、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然而，就是在这相对稳定的时期内，革命斗争仍在不断爆发，例如：1925年，摩洛哥、叙利亚发生暴动，1926年英国发生大罢工，1927年奥地利维也纳工人的暴动，

以及 1925 至 1927 年间中国发生的大革命。这些革命斗争虽然都遭到了失败，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仍在急剧的发展。因此，自 1928 年以后，世界资本主义又进入了新的总危机时期。

资本主义的深刻危机，使它不能不加紧对殖民地劳苦群众的剥削和压迫，这样也就使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日益高涨。巴勒斯坦、南非等地的工人暴动，朝鲜南安劳苦群众的英勇斗争，以及印度工农的革命斗争，都给殖民主义统治者以沉重地打击。随着殖民地广大农民群众加入革命斗争，工人阶级领导革命的加强，殖民地革命亦愈成为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摧命符。这其中，中国革命的兴起，更加动摇了资本主义殖民地统治的基础。中国革命自 1927 年失败以后，经过短暂的消沉状态之后，又重新进入复兴的形势之中。城市工人的斗争，农村的游击战争，苏维埃区域的建立扩大，反革命军队的崩溃等，都标志着革命高潮的日益迫近。

在这样伟大的革命变革时代，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革命斗争，迫切需要革命理论的指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革命理论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正确的革命理论，是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是革命运动发展的指南针。没有革命理论，革命就容易陷入错误，甚至遭到失败。俄国十月革命所以能取得胜利，正是俄国革命者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论指导下，排除一切错误倾向的干扰，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证明，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运动，只有在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理论的指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因此说，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就成为革命时代的一种历史的必然，一种时代的需要。而任何一种适应时代需要的理论，不管

反对派怎样压制、封锁，它的传播和发展都是不可阻挡的。中国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兴起，正是这种历史必然、时代需要的反映。

1927年以后在中国兴起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既与整个世界革命发展的潮流相联系，同时也是中国国内各种矛盾激化、革命重新高涨的必然要求。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虽然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而归于失败了，但是，大革命所提出的无数迫切的任务，无数紧要的问题，在革命失败以后，丝毫没有解决。然而，不解决这些问题，不完成这些任务，中国的政治经济就没有出路，劳苦大众就不能得到解放。

大革命失败后，在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血泊中建立起来的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给全国人民带来的是更加深重的灾难。国民党新军阀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的统治，不惜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使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统治重新得到了恢复和加强。例如，1928年3月，国民党政府向炮击南京、镇压中国革命的英美等帝国主义赔款、道歉。同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蒋介石为求得帝国主义的“谅解”，竟命令中国军队不许抵抗，任凭日军缴械。国民党新军阀统治者虽然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在实际上，军阀之间的战争依然不断。从1927年8月至1930年，爆发的军阀战争就有六、七次之多，战祸遍及大半个中国，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罕见的。

外来的压迫和内部的战乱，使中国的国民经济达到了完全破产的地步。全国的民族工商业，基本处于破产和半破产的状态（文学作品《子夜》和《林家铺子》对此曾作了生动的描述），能够得到发展的，只是握有特权的帝国主义所经营的工

厂和商业。城市工人大批失业，工时延长，工资下降，城市下层小资产阶级也同样处境艰难，许多手工业者和小商人沦于破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失学失业，言论无自由，生命无保障。全国的农业，更是日趋衰败萎缩。土地日益集中到地主富农手中，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再加上连年战祸天灾，广大贫苦农民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文学作品《春蚕》、《秋收》、《残冬》曾出色地表现了广大农民的深重苦难和他们从守旧、迷惘中觉醒，终于起来反抗的历史动向）。

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双重压迫下，中国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除了反抗斗争之外，并无其它出路。于是，城市工人的罢工斗争，乡村农民的起义和红军的扩大，以及革命的兵变等，汇合成伟大的革命力量，展示着中国革命的重新高涨。在这样的形势之下，革命党人和革命群众对于革命理论的热烈追求，自然是意中之事。革命斗争的发展，要求对于革命的任务、性质和方法等革命的基本问题有更深刻的了解。怎样才能了解呢？只有在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能获得成功。中国人民正是从世界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教训中，懂得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给他们指示出路，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唯一指南。也就是说，要解决 1927 年以后中国革命的出路问题，必须求教于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介绍和阐发为中心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兴起发展的客观基础和实践动力。正如梁平 1930 年 9 月在《中国社会科学运动的意义》（载《世界文化》创刊号，1930 年 9 月出版）中所指出的：中国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兴起，是客观革命形势所必有的思想上的反映，是伟大变革时期上的必然的产物，是整个工农革命运动中的一部分。

在革命实践需要的呼唤下，一批留日、留苏的革命知识分子，不惜放下手中正在进行的毕业试验，放弃即将到手的毕业文凭，纷纷从国外回到当时的革命中心——上海，开始革命理论的宣传工作。接着，一批从前线撤退下来的党的理论工作者和进步文化人士，也陆续汇集上海。这几支力量的汇合，成为新兴社会科学运动兴起的主要骨干。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充分利用上海这座革命文化名城的种种有利条件，创办书店，出版刊物；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翻译、研究和介绍，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新兴社会科学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大地上蓬勃怒发，风靡全国，深入人心。

（二）兴起的前奏

中国新兴社会科学运动兴起的前奏曲，是由朱镜我、彭康、李初梨、李铁声、李一氓、冯乃超等一批血气方刚的革命青年知识分子首先奏响的。1927年10月始，留学日本的朱镜我、冯乃超、李初梨、彭康等先后回国。回国后，他们以革命团体“创造社”为活动基地，编辑出版了《文化批判》、《流沙》、《思想》等刊物。在这些刊物上，相继发表了许多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论文和译文，从而打破了大革命失败后进步思想理论界的沉闷空气，奏响了新兴社会科学运动蓬勃兴起的前奏曲。

《文化批判》杂志，于1928年1月15日创刊。成仿吾在创刊号的祝词中指出：新兴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和传播是该刊的宗旨和任务。“《文化批判》将从事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的批判，它将描出近代帝国主义的行乐图，它将解答我们‘干什么’的问题，指导我们从那里干起。《文化批判》将贡献全部的革命

理论，将给予革命的全战线以朗朗的火光，这是一种伟大的启蒙。”本着这一宗旨，《文化批判》每一期发表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论文和译文要占一半以上。其中重要的产生一定影响的文章有：朱镜我的《理论与实践》、《科学的社会观》、《政治一般的社会的基础——国家起源及其灭亡》；彭康的《哲学的任务是什么》、《科学与人生观——近几年来中国思想界的总结算》、《唯物史观的构成过程》、《思维与存在——辩证法的唯物论》；李铁声译的《辩证法的唯物论》；李初梨的《唯物辩证法精要》等。除论文和译文外，《文化批判》还专辟了“新辞源”栏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作出较为详细的解释和说明。《文化批判》出至第5号，即被查禁。

《思想》月刊是在《文化批判》被查禁后，以另一名称出版的刊物，其思想内容、编辑方针与《文化批判》完全一致。在《思想》上登载的重要文章有克兴的《意识形态的变革与唯物辩证法》；李铁声译的《“哲学底贫困”底拔萃》等。《思想》出了五期，又被迫停刊。

《流沙》半月刊，创办于1928年3月，内容以社会科学论文和文学作品为主，执笔者有华汉、彭康、朱镜我、李一氓、成仿吾等。其中五月出版的特刊号，登载了李一氓译的《唯物史观原文》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渊源》两篇重要文章。在特刊号的“社会运动家和社会思想家”专栏里，发表了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生平活动的文章。

以上几种刊物所发表的文章，大多联系中国当时的社会实际，从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等方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尤其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的哲学基础——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所特有的阶级性、实践性。例如彭康